



宝鸡何以成为「青铜器之乡」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经历了约1500年的历史。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在殷商时代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的工艺技术。

宝鸡作为西周王朝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时期。自汉代以来,宝鸡境内就不断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可以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制作技艺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高水平。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宝鸡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窖藏多、出土地点密集、周原地区出土多、西周时代多、有铭铜器多等;从器物本身来看,宝鸡青铜器的特点有“五多”。

一是数量多。汉以降,宝鸡地区青铜器出土不断。特别是从清朝初年开始,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宝鸡出土青铜器见于著录的数量骤增,宝鸡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区域。如今,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正如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所说:“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青铜器。”

二是重器多。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宗庙重器多、礼器多、国宝级

的多。目前,宝鸡地区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088件,约占全国同级别青铜器总数的71%;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8件、二级文物401件、三级文物529件。国家公布的三批限制出境文物名录中,青铜器共36件,宝鸡有8件入选,占近四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宝鸡地区的馆藏文物在原来确定级别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筛选,从一级文物中筛选出55件最精的藏品,誉为“国宝级”文物,其中青铜器有10组(13件)。著名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海内三宝”(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均出土于宝鸡。

宝鸡许多青铜器有着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比如,散氏盘被誉为中国第一件地契,《音“营”》匾被称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刑事判决书,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大盂鼎被称为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大克鼎的铭文是西周时代书法成就的集中代表……宝鸡的青铜器还成为不少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比如国家博物院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散氏盘,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牛尊等。

三是精品多。宝鸡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更在于它的质量。西周时代正值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青铜器制作技艺精湛、品种繁多。有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玺印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觥(音“至”)、斝(音“甲”)、尊、壶、卣(音“有”)、彝、觥(音“工”)、罍(音“雷”)、盃(音“禾”)、勺、禁等多个器种,而且每一种器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也花样繁多。从出土器物来看,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造型独特、工艺精良、美观大方。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代表之作,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成就。

比如折觥,主体造型采用了圆雕手法,主体花纹也以高浮雕技法而成,其花纹上既有云雷纹填底,又有阴线附身,全身动物纹饰有饕餮、夔(音“魁”)龙、大象、小蛇、飞燕、鸣蝉、鸱(音“吃”)鸟、神龟等数十个,四层纹饰造型,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是写实与抽象的完美结合。雕铸如此精美的青铜艺术品,不仅要有高超的造型技艺,还要有深邃的艺术思维。

又如伯各卣,通体以云雷纹衬地,采用以浮雕、圆雕和平雕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造型厚重,纹饰华丽,充满神秘色彩,充分表现了古人对鬼神的畏惧与虔敬,是西周早期不可多得青铜艺术珍品。凤翔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经典之作,使用了浇铸、编织、铆接、镂空等多种工艺技术,用失蜡法浇铸而成。其设计巧妙,纹饰瑰丽,铸造手法奇巧,就是现代工艺也很难仿造。正因为宝鸡青铜器精美程度令人咋舌,所以成了中国青铜器的“形象大使”,时常出现在各种宣传画上,或是成为青铜器礼品的原型。

四是铭文多。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与其他国家青铜器明显不同。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族徽”式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西周是铭文大发展时期,出现了长篇巨制。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铭文。从目前资料来看,能收集到铭文的就多达700余件,近20000字。其中,毛公鼎铭文497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这些铭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西周的社会生活,涉及到政治谋划、征战杀伐、祭祀造命、册赏宴飨、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婚嫁礼俗等方面,完全可以验证后世编纂的历史文献的真伪。

五是标准器多。标准器,也叫断代标准器,是为历史断代研究提供年代标准的器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有近3000年。为此,国家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门研究历史纪年断代问题,而青铜器上有历史纪年的铭文,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于是,宝鸡出土的大量带有纪年铭文的青铜器就成了研究重点之一。在眉县杨家村窖藏未发现前,国内有纪年的青铜器只有60多件,标准器有38件,其中宝鸡出土的15件,占40%。杨家村窖藏出土的27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其中,逖鼎、逖盘均为标准器,逖鼎共有12件,而逖盘中的铭文几乎完整地记录了西周诸王世系,印证了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关于西周王系记载的真实性,为西周晚期青铜器谱系研究、断代提供了证据,可谓“青铜史书”。(杨明)



张载：“四为”“六有”泽被后世

在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城东26公里处的横渠镇,一座以宋式为主,兼有明清特色的院落,静谧而厚重地驻居在街巷一隅,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张载祠,也是横渠书院所在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曾引用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金石名言就是出自横渠先生——张载。

A 一生坎坷志存高远 执著立言创立关学

张载,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天禧四年(1020年)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他为后世留下的“尊礼贵德”的人文价值、“横渠四句”的太平理念、“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史料记载,张载从小天资聪明,15岁时,父亲张迪病故,家人决定将其移棺至原籍大梁安葬。张载和5岁的弟弟张戢与母亲陆氏,护送父亲灵柩,行至横渠镇时,因身上盘缠不足,又听前方发生战乱,于是将父亲安葬于横渠镇南8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上。从此,张载便在眉县安家,入横渠镇崇寿院读书,后来被邀至开封、长安以及武功绿野书院、扶风仙山寺等地讲学,门徒多为关中地区学识之士和在朝官员。

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朝廷与西夏议和,并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张载一直有精武救国思想,他就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

议九条》,陈述自己欲收复被西夏夺去的陕西之地的设想。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见了张载,认为张载作为儒生,日后定成大器,便劝他弃武从文,勉励他从《中庸》读起,研习儒家经典。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于是,遍读佛、道家之书,后觉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历经十余年攻读,张载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通的道理,逐渐形成独特的关学体系。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此后,他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西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

在作云岩县令时,他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51岁时,因对王安石新政变法有看法,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依靠家中薄田生活,在少时读书的崇寿院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被推荐得以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支持推行复古婚丧祭之礼未果,又借病辞官回家。当年农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馆舍,沐浴就寝,次日清晨辞世,终年58岁。辞世时,仅有一个外甥在身边,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安葬。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在张载祠南7公里外的大镇谷迷狐岭,张载墓便坐落于此。这百亩墓园,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戢的安葬之地。张载讲学的崇寿院也被改为横渠书院,后世尊称张载为“横渠先生张夫子”。

B “横渠四句”关学精髓 治世施政立心立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学,为天下开太平。”2007年4月13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东京立命馆大学对学生讲“立命”时讲到了张载的“四为”思想。在张载的精神遗产中,这四句名言被广为传诵,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称其为“横渠四句”。这22个字所蕴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用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即要探究宇宙的规律,寻求人类健康发展的真理,继承先贤圣人的进步思想,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治国理政,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人类都过上幸福无忧的美好生活。这便是张载的治世施政理念。

张载学术文献集成与理学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林乐昌认为,“横渠四句”前三句,意在为社会奠定长久的精神文化根基,体现了张载的远见卓识。

“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古代知识分子为天下为己任的经典表述,也是最具中国风格并影响至今的大国和理念。“四为”涉及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道统传承、社会理想,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感。“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刘学智说。

张载一生清贫,常年与百姓生活在社会底层,体味着百姓生活状态,积极推行自己

“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爱民”的道德风范,“精思力行”的学风,“大心体物”的气度,“太虚即气”的唯物宇宙观,“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共同构建起“关学”思想的学术体系。

据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介绍,“关学”是张载始创,后由他的弟子及南宋、元、明、清的后继者一脉相承,在关中地区流行的一个理学家派,和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共同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四大学派,人们称为“濂、洛、关、闽”。

在张载祠内,矗立着两块分别刻着《东铭》和《西铭》(又名《订顽》)的石碑,《西铭》取自《礼记·礼运篇》,著名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就出自这篇短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海内外专家学者,张载后裔,不远万里前来张载祠拜谒求学,开展学术交流互动。此外,一些有关张载尤其是“四为”思想的著作在海外出版发行,且《西铭》也已入选日本及韩国教材。

C “六有”“十戒”规范伦理 教子育孙礼德兼修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宋史》张载本传以“尊礼贵德”评价张载之学。张载伦理学由礼论和德论构成。礼论,属于张载伦理学的“规范伦理”;对于个体修养,他主张“知礼成性”“以礼成德”;对于教育内容,他主张“以礼为教”;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用礼成俗”。

张载极其重视对家族子弟及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眉县政协原主席、地方文化研究者卢文远称,针对家族人员,张载制定了基础的家规家训,即“六有”“十戒”,规范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六有”是张载15岁时护柩回籍途中,在勉县拜谒武侯祠后题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是:说话应有教养,行动应有规矩。白天要有所作为,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心得。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候,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而要有所收获存养。

后来,张载又提出了“十戒”:戒淫逸朋队伍;戒好鲜美食;戒驰马剑斗鸡走狗;戒滥饮狂歌;戒早睡晏起;戒依父兄势轻动打骂;戒喜行尖酸事;戒近奢靡;戒气质高傲不循矩;戒多谗言习市语。

这十条戒规也反映了张载及家族的一种文化信念,为张氏后裔子孙为人处世立下了规矩。在“六有”“十戒”的基础上,张载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规范要求,特别是撰写了《东铭》《西铭》训辞,书于书院大门两侧,是家族子弟与学生必须烂熟于心的座右铭。

《东铭》强调做人要诚实,既不要欺瞒别人,也不要自欺欺人;《西铭》强调要有博大的胸怀,孝顺长辈,慈爱孤弱,救济天下困苦百姓。

张载的家规家训,体现了张载的思想精华,既有思想境界极高的“四为”“六有”,也有规范具体言行的“十戒”,为张载后裔子孙确立了精神活动的追求方向和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至今仍被张氏子孙铭记于中,世代传承,并且传遍关中平原、三秦大地,影响深远。(龚仕建)

